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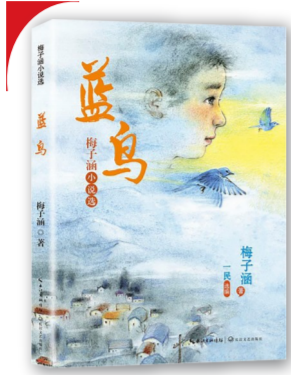
生命啊，你是一只飞翔的蓝鸟

关键词 人物塑造 内心独白 儿童视角

刘叶露

从《绿光芒》到《黄麦地》再到《蓝鸟》，作家梅子涵用丰富的色彩构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绿色，代表希望和新生，春天的那一抹绿色，宣告寒冷的离去，生命的轮回，一切都是那么富有朝气。绿色不那么热烈和咄咄逼人，绿色的光芒带给人的是清凉和舒适之感，正如《绿光芒》这本书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像绿叶一样平凡的小事，却能在读者生命的长河中泛起点点涟漪，感受到人性的光芒。拿起《黄麦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油画，蓝天如洗，麦地金黄，人们赶着马车走在田埂上，不疾不徐。这是努力之后的淡定和从容。梅子涵说：“文学创作也是栽种，一粒小种子，长出金黄，照耀遍地人间。”他在自己的黄麦地上辛勤耕耘，把寻常的故事烤得金黄，用它特有的香气感染着我，让我们不禁为平凡努力的人生而骄傲动容。

《蓝鸟》是梅子涵的小说精品集，收录了作家18篇作品，时间跨度40年，从满头青丝写到白发胜雪，作家真诚如初，童心依旧，就像封面上的那只蓝鸟，一直保持着飞翔的姿态，始终如新且有力量。蓝色，是清新宁静的颜色，正如这部作品的基调，是澄澈诗意温暖的。作者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关注特殊儿童，给同学送录取通知书，骗儿子找到了饭票……塑造了外表不起眼的马老师、笨拙心善的老牛、善解人意的妈妈、可爱早逝的妹妹……这些人物形象，展现了师生情、友情、亲情的可贵和美好。在作家笔下，爱，赋予平凡的生命强大的精神能量。蓝色又是神秘而梦幻的，蓝鸟象征着神秘



《蓝鸟》梅子涵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7月版
ISBN: 9787570230693

的不可琢磨的梦想。在《蓝鸟》这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一个立誓从窝囊、窒息的气氛中冲出来，要考取别人都不敢想的学校——植树王的少年形象。没有只言片语的外貌描写，全篇都是少年的内心独白，读者却可以从这一堆废话中拼接出一个情绪激动的，带一些偏执的，对梦想执着坚定的少年形象，非常鲜活。是做床底下的风筝——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接受既定的命运安排——循规蹈矩，考汤山中学——毕业再考汤山林校——或者读个中专，读出来是个干部待遇；还是做一只飞翔在天空上的蓝鸟——去最好的中学植树王——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蓝鸟》中的那个少年做出了自己坚定的选择，他奔跑在绿色的山岗，一只脱线的风筝，一只展翅飞翔的蓝鸟，寓意着少年不被定义的人生。蓝色，也是一种博大的颜色，天空、大海、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都是蓝色的。它代表着永恒。关注儿童命运，呵护儿童；回到童年，以儿童的视角抒写童年，是梅子涵永恒的艺术追求。《小渡》细腻地表现了一个男孩敏感倔强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投射了自己最大的善意和温暖。《侦察鬼》《游击队》等作品融入了作家童年的记忆，表现了儿童稚趣的内心，让我们似曾相识，又仿佛离我们甚远。这种艺术的真实带给读者更加强烈的审美感受——回不去的童年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美好的存在。

40年漫漫写作路，梅子涵一步一步往前走，一个字叠加一个字，慢慢地一个故事写出来了，影响着他自己，也感动着其他人。平凡的人和事，因为这些文字而流光溢彩，有了飞翔的姿态，也有了坚韧的力量。

气系统、升级供气系统、加强员工技能和环保意识培训、实施清洁生产等。以上措施的实施，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目前，公司单位产品VOCs排放量比之前下降了71.06%，单位产品危险废物产生量比之前下降了4.65%，单位产品能耗比之前下降了29%，每年节约用电约294万千瓦时、减少CO2排放1733吨。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年递增，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逐年提升。

采访中，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将以此次入围北京市出版物印刷企业绿色发展奖励项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企业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北京市出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重点保障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北京市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穆宏志)

汇林印务入围北京出版物印企绿色发展奖励项目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日前，记者在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采访时获悉，该公司以绝对优势入围北京市出版物印刷企业绿色发展奖励项目。

据了解，作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出版物印刷服务首都核心功能重点保障企业”“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示范企业”“京津冀协同发展绿色印刷优秀企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始终坚持走绿色印刷、低碳环保的发展之路。

为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废物的产生与排放，有效改善员工的劳动环境和操作条件，减少生产过程对员工健康的影响，增加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公司先后投入1800余万元，淘汰更换高耗能电机和设备、增加润版液集中配比系统、更换油烟净化装置、改造车间的负压供

深入发掘河南明清古戏台文化内涵

关键词 河南 明清 古戏台

刘琳

戏台，是戏曲演出的主要场所，也称舞楼、乐楼、戏楼、舞厅、乐厅、舞台等。古戏台作为实物载体，见证了我国戏曲孕育产生、发展壮大和走向辉煌的全过程，推动和延续着千百年来戏曲文化。它是中国古代人们娱神的重要场所，是广大群众主要的娱乐性建筑，同时也是古代戏曲发展的重要见证。中州古籍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由刘明阁、杨运秀所著的《河南明清古戏台调查研究》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记述了河南明清时期不同形制的古戏台，而且论述了这些古戏台与当地、当时流行戏曲剧种的依存关系，分析了古戏台上戏曲楹联的社会功能，发掘了河南明清时期古戏台的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认识、了解河南戏曲演出场所的变迁、河南戏曲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戏曲建筑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对神庙戏台、宗祠戏台、会馆戏台演化的原因及社会功能进行分析，根据现存戏曲碑刻的记载，进行分类，逐项分析，为研究明清时期河南社会经济发展、地方戏曲的流变、剧场发展、建筑艺术等提供真实可信的材料支撑。

承前启后，聚焦河南现存明清古戏台。古戏台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进入学界视野。戏曲史家周贻白先生的专著《中国剧场史》是我国最早涉及剧场形制及其历史演变的论著。之后陆续有其他专著问世，如《戏曲文物考》《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等。研究性的文章有《河南清代戏场建筑研究》《河南典型古戏台建筑现状调查及研究》等。这些专著和文章在本书的第一章“明清古戏台研究综述”中有详细介绍。在汉代，艺术的表演形式是百戏，对于表演场地没有特别的要求。从唐代开始，出现了用来表演歌舞音乐的场所，如歌场、戏场。宋代，戏曲逐渐走向成熟时期，出现了瓦舍勾栏，这是专供杂剧、南戏的演出场所。随着戏曲表演技术的多元化，演出场所也出现了多样化，明清古戏台展示了河南戏曲艺术的辉煌。自雍正年间起，河南戏台建筑的建设开始进入高潮。而其形制也较之前有继承有发展。以上这些在书中第二章“戏台发展历史”和第三章“明清古戏台的建筑形式”中有详细的介绍，既有总结，又有启发，可谓承前启后，把研究聚焦在河南现存明清古戏台。

根据功用，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四类戏台。古戏台的建筑受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的影响，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戏曲艺术、建筑艺术的宝贵遗存。按其功用，分为神庙戏台、宗

祠戏台、宫廷戏台、私宅邸邸戏台、会馆戏台、村寨戏台等。作者通过归纳分类，对河南明清时期的古戏台进行梳理，主要从神庙戏台、宗祠戏台、会馆戏台、村寨戏台四个方面对河南现存明清古戏台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如神庙戏台之郑州市城隍庙古戏楼、荥阳王村火神庙古戏楼、新密城隍庙戏楼等；宗祠戏台之巩义市桥上村崔氏祠堂戏楼、巩义市鲁庄镇姚氏家庙戏楼、洛宁县中庄村李家祠堂戏楼等；会馆戏台之洛阳山陕会馆戏楼、禹州怀帮会馆戏楼、社旗山陕会馆戏楼等；村寨戏台之陕州区柳沟戏楼、灵宝市大寨村戏楼、安阳殷都区都里镇东水村官房戏楼等，均从戏台功能、民俗、建筑艺术等进行爬梳剔抉，发现了河南明清时期戏曲不仅仅保留了祭祀酬愿的巫术思维性质、娱乐游戏的审美功能特征，还具有帮助宗教、社会组织、地缘组织内部或者相互之间完成文约的订立、乡规的推行、商业的管控、风化的扭转等社会管理功能。

戏曲楹联——戏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戏台上的戏曲楹联大多出自文人雅士之手，或高雅，或通俗，或诙谐，生动地反映了戏曲与人生的关系，体现出戏曲的社会功能。作者将河南明清古戏台戏曲楹联的社会功能归结为：富含人生哲理，启迪观众智慧；描绘戏曲意境，展现舞台效果；大量引经据典，弘扬传统文化；总结戏曲内容，劝说世人向善；体现诙谐调侃，凸显对联艺术；赞扬演员技艺，反映演员疾苦。6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河南明清古戏台戏曲楹联的社会功用。戏曲楹联从多角度多视野展示了戏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凝结着人们对楹联文化的情素。既有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些舞台楹联经久而不衰的艺术珍品，无疑是楹联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河南是戏曲大省，历史悠久，遗产丰富。近些年，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许多古戏台被遗弃，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自然坍塌或被人为损坏。因此，调查、分析和研究留存下来的这些古戏台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两位作者非常重视戏曲的学术研究。从2019年起，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河南省古戏台的考察，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此书。

面对当下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在增强文化自信自强的感召下，如何对古戏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得非常必要和迫切。古戏台研究涉及民族民间文化的许多方面，如历史学、戏曲学、考古学、建筑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通过文献资料、文物资料等对现存河南典型古戏台展开综合性实地考察及深入研究，作者努力探索一条合理利用及弘扬发展的途径，使这一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合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河南明清古戏台调查研究》刘明阁、杨运秀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11月版
ISBN: 9787573805867

系统梳理大地文明起源遗产的力作

——读《塑造中国：东亚大陆腹地早期聚落组织与空间架构》

■孟宪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塑造中国：东亚大陆腹地早期聚落组织与空间架构》
王鲁民著/大象出版社2023年5月版/86.00元/ISBN: 9787571117269

离不开对传世文献的适当利用。作者指出，《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提供了自黄帝起的连续性极强的历史记述，特别是《今本竹书纪年》对大禹以后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记述更详细，只要与考古材料进行相对系统的比照，就可以看到相应记述与考古材料显示的空间态势、逻辑完全一致。因而更多地利用前者是该书特点之一。不仅如此，由于一系列“神话叙述”与考古现象的耦合，“中国”塑造的历程可以推至更为遥远的过去。

距今约1.3万年，后套木嘎遗址(吉林省大安市)一期遗存，出现了东亚大陆腹地地知最早的以神圣的壕沟。距今约8000年，燕山以北地区呈现5个设围基址并存的局面，成为东亚大陆腹地政治、文化发展最活跃的地方。经历了仰韶文化初、早期，公元前3900年前后，函谷关至郑州一线出现10个设围基址构成的设围基址群，以其他地区设围基址大幅减少或消失为背景，突显了强势地位。公元前3200年前后，由关东到郑州沿黄河布局的庞大设围基址系统，揭示了东亚大陆腹地最重要的“神明之隳”的空间控制价值，使一个实体性的“中国”得到完整呈现。而双槐树、青台设围基址安排北斗图案，还将“中国”与幽远的北方亦即东亚大陆腹地最早的设围基址后套木嘎遗址联系起来。

以上述连续的设围基址系统变迁为基础，作者提出了华夏文明发源于东亚大草原与辽河流域交会地区的看法，使现有考古资料得以系统性“历史化”。

要读懂这本书，理解其重要性，提出批评，最好也去看看学界前辈的

著述。以下仅是他们给我启发的凤毛麟角。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的辞世之作，因既“能反映考古学的一个新时代”，又能“雅俗共赏”，已一版再版。我国最高领导人1999年对外讲演开始采用“五千年”文明提法，较前多了一个“多”字，依据的是考古成果，大概主要是苏公这部书。拙文《跨越重点引领未来——试论文明探源工程》还提及：“人类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国家就属于制度文明。礼仪性建筑是制度文明的实证，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没想到，现在《塑造中国》以上万考古成果及传世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出上古社会—政治空间转换的源流及背后故事。苏先生的不少预见可在《塑造中国》找到印证，如他所说兴隆洼、查海遗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民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所以文明起步超过万年”，后套木嘎的设围基址就确超万年不少呢！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最后篇章“双接轨”中，苏公写道：“所以面对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界以及国与国、人与人关系这一难题，西方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21世纪的中国学将要成为世界学。”从“神明之隳”到“设围基址”的“中国”塑造，正是人与自然、人与关系的生动写照。拙文《中国现代考古百年之始与开拓名胜先导的生态文明考古学》提议，文明探源应将生态演化作为重点，“国家起源研究最终目的，实为世界大同。各国共同善待自然才有未来”。

《古迹的发现与其影响》是郑振铎先生1929年发表的，该文概括了考古发掘的“重要性”：第一，将失去的古代重现；第二，使我们直接与史迹面对面相见，不必依靠传说失真的记载；第三，证明古代著作、神话、传说，向来以为虚妄缥缈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有真实成分在内，有时可知其构成原因。这应是郑先生对当时疑古、信古之争的解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中国》可以视为对郑先生说法的响应，从海量的考古发掘成果出发，解析传世文献，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跃在了祖国大地。对于郑先生的提问：究竟如何去“做有系统、有意义、有方法的工作”？《塑造中国》的讨论也可以作某种参考。郑先生说：“我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遗产，这不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孙子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这段话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只有尊重、保护和学习大地遗产，才能在创新的同时获得一地一国乃至世界的全体人民和代际的凝聚力，而创新力与凝聚力共同构成的生命活力，正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力量！所以《塑造中国》对大地遗产的梳理，意义重大。

拙文《大遗址传承：美丽城镇的文化复兴》提到：“从众多城址出发，既然李济可以做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那么今人探索中国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新问题，绝非难不可及。”研究中国形成，也当如此。在我看来，《塑造中国》的写作表明，相对系统的城址考古成果和前辈学者奠定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中国形成这一问题。

“在大地上作画，这就是文明”！我曾在回顾大力抢救良渚遗址群的文章中这样有感而发，读王鲁民教授的新作《塑造中国》更有同感。这部学术著作十分严谨，却文采飞扬、亲切可人，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关心中国 and 人类文明探索者，都值得去品味。有关专业工作者更可从中看到“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的途径。

《塑造中国》的第一章“绪论”，明示自成系统的分类方法。书中指出西周“何尊”上的“中国”：“中”意为“中央”，“国”意为“地域”，而“认定洛阳盆地为大地的中央，当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空间认知。”书中认为因文献匮乏，要想了解上古相应地区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就得更积极地依靠考古材料的分析。即通过对考古遗址的空间覆盖范围、关键者分布格局，以及呈现的组织特征，窥探何以洛阳盆地及周边地区被视为“中国”及不同时期“中国”的存在状态。

开展上古“中国”塑造讨论，基础之一是对具体地理形势的理解。胡焕庸线以东的东亚大陆腹地，除了黄河、长江、欧亚大草原和东亚大平原诸突出地理要素外，作者特别提请注意的，是那些南北向的长程河流及相应地域，这些地区拥有更为多样的动植物生存环境，促使有关族群更多地迁徙、互动，在大型族群甚至大型权力的生成上有特殊意义。把自然、地理条件不仅作为提供个体生存资源的条件，并且视为人群互动与空间控制的前置背景，为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设围基址(遗址)”是作者提出的重要概念。已知的上万处遗址中，设围遗址不过三四百处，表明了其特殊性。上古工程能力有限，挖掘壕沟一开始就是非同寻常的做法，超越了空间界分价值，是有关地段特别重要的标志。作者指出，不同的圈层格局意味着不同的祭祀等级。由设围遗址的坐落看，它们往往在一些地点(高等级的“神明之隳”)持续、反复、成群地出现。由“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说起，作者解析了《史记·封禅书》所云“神明之隳”。除长程河流出口外，长程河流源头地、长程河流的交汇处、入山口处，与山体相夹，河道剧烈转折处，两条河源头或河道接近处，山体和大海相夹处，也是设围基址选择的“神明之隳”。设围基址等级序列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神明之隳”占据者实力有差异。设围基址群的出现，就占者实力来说，意味有形成支配更大范围权力的自然条件。在车、马未用的远古，诸多高等级“神明之隳”中，具体的自然条件决定了郑洛一线的地位最高。东周以前的诸多时期，最高等级的设围基址只在这一线出现，可以作为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定“中国”为东亚大陆腹地最神圣地点的证据。

遗址间的社会—政治关系判定，是探究相应时期社会组织、政治架构、社会发展阶段的基础，也是考古学的基础问题之一，以上的讨论，为该书的发展提供了必须的条件。

依托考古材料分析，能够得到一定水平的对古人空间认知的了解，但要想获得塑造“中国”历程及上古空间架构的相对完整和真切的知识，